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八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

开本2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7/8 字数 150,000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统一书号: 11072·64

定 价: 0.6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回忆	张崇恩(1)
庚子沦陷后的天津	李然犀(8)
庚子回忆片断(三篇)	张修华 张玉德 金大扬(13)
回忆民初争取女权和反袁斗争	傅文郁(20)
我在东北军的经历和见闻	赵绍武(31)
张作霖处理郭松龄反奉事件的经过	刘焕文(60)
回忆张伯苓逝世后总理的一次谈话	王华棠(73)
张伯苓先生传略	张锡祚(75)
张伯苓先生事略	王斗瞻(119)
早期的南开中学	黄钰生(130)
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	杜建时(150)
我对张伯苓校长与南开学校的回忆	杨肖彭(163)
回忆南开与张伯苓片断(五篇) 杨鸿烈 曹汉奇 何炳棣 仇铁隼 杨坚白	(177)
张伯苓先生函稿	梁吉生 杨珣辑录(190)
补 白	张伯苓二三事(74) (118) (149) 南开校友会 (176)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回忆

张 崇 恩

庚子那年我十二岁，家住通州，因为全家信奉基督教的原故，义和团起事后，在家乡难以存身，于是随寡母和弟弟们全家六人，在农历端午节前的一个夜晚，逃到了北京城里。

到了北京以后，先投奔灯市口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想藉着美国教会的势力，暂时在那里避难。但不料刚刚到贝满女中以后不大的功夫，就得到了学校当局的通知：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避难的教徒，一律在当天下午集中到孝顺胡同美以美会亚斯立堂。于是我们又随大家一道转移。到了亚斯立堂以后，看到已经有很多中外教徒麋集在那里避难，堂小人多，拥挤不堪。这时外面的风声日紧，传说义和团就要进城，在教堂里避难的人们惶恐不安。外国传教士从教徒中间挑选了一大批青壮年，编成队伍，配合驻扎在教堂里的美国兵，站岗巡逻，构筑工事，准备抵御义和团的进攻。情势一天紧似一天，不久义和团就从崇文门进城了，在东交民巷东口与奥国使馆的卫兵发生了冲突，亚斯立堂的美兵也开枪截击，结果打死打伤了不少拳民，因此激起了义和团更大的愤怒，开始焚烧城内的教堂。亚斯立堂有美国兵保护着，暂时相安无事，但被困在教堂里的教徒们都惶惶不可终日，知道大难将要临头。

就在农历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教会当局传示说：清政府总理衙门给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下了通牒，限令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一律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退出北京，由中国政府派兵保护送到天津上船回国，过期不走，中国政府不负保护责任。公使团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通知亚斯立堂里的外国人在二十四日下午三点钟以前集合，准备撤出北京。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教徒说：“亲爱的教友们！我们实在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自己赶快想办法吧！”中国教徒们听了这话以后，真如霹雳当头，个个目瞪口呆，有的全家抱头痛哭，凄凄惨惨，无计可施，只有呆在这里等死吧！

到了二十四日中午的时候，教会当局忽然传来通知说：今晨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商谈撤退问题时，在东单牌楼地方被虎神营兵士杀害。公使团认为中国政府不能保障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决定各国公使留守使馆，拒绝撤退。教会当局提出，教徒们凡愿意到使馆去避难的，务必在当日下午三点钟以前在礼拜堂门前集合，一齐出发。大家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急忙收拾行李衣物，准备转移到使馆去。

大家收拾停当，在下午三点多钟时，列队从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出发了。在出发之前，先由二十余名美国兵从孝顺胡同口起至东交民巷东口止，布置了岗哨。出发的行列是：头前是几名外国人抬着克林德的灵柩，其次是外国妇孺，再次是带有枪枝的外国青壮年，然后便是中国教徒的老幼和妇女，殿后的是青壮年的中国教徒，也配备了武器。队伍走在街上浩浩荡荡，但却鸦雀无声，甚至连婴儿的啼哭声都没有。当时崇文门大街两旁的商店和住户，都大门紧闭，路上也看不到有什么行人。遥望崇文门城楼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头戴红缨帽、身穿青马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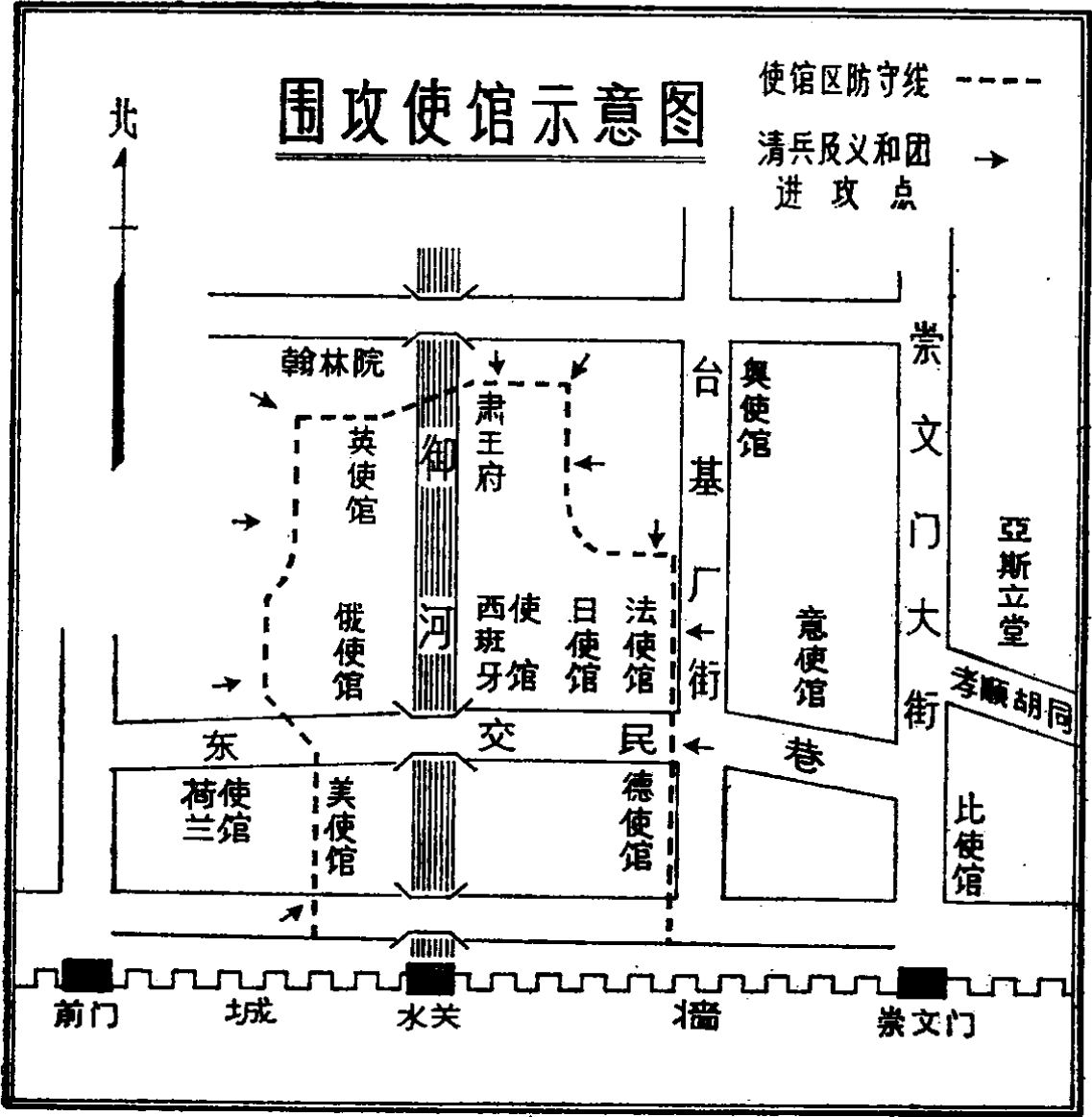
的清旗兵，个个持枪伫立。我们知道这是九门提督庆亲王的八旗兵。他们注视着我们这支队伍悄悄行进，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而安全地进入了东交民巷。克林德的灵柩和一些外国妇女进入了英国使馆，我们都集中到肃王府。

我们刚走进肃王府的东辕门，就看见有很多天主教徒已经先我们而到达了。我们在炎日下背着行李走了这一段路，都有些疲乏，到了目的地后，连忙放下行李，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但是，就在我们喘息未定的时候，忽然听到轰的一声，紧接着炮弹凌空爆炸，四面八方枪声密集，顿时把我们都吓坏了。人们不约而同的纷纷跪在地上，合着眼睛，两手併在胸前，连声哀求上帝保佑……。清政府果真的按照通牒规定行事，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即五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四点钟，向外国使馆区开了火，同时把使馆区严密地包围了起来。

围攻使馆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义和团加以配合。他们在开始攻打时，采用了火攻的战术，向使馆及肃王府内投射火炬，抛掷裹以棉絮蘸上洋油的长竿，烧毁了不少房屋，特别是西端的荷兰使馆，东端的奥使馆、意使馆和比使馆，因为地处东交民巷的外沿，首当其冲，很快就被焚毁了。开火还不到半个钟头，日本海军及意国海军就都撤入肃王府，日本海军有二十余人，由军官率领，进府后就分兵两路，一半据守大殿旁边的东墙，另一半到后花园。意国海军二十余人也撤到肃王府的后花园。日、意两国士兵及协同作战的教徒约有六十余人，把肃王府后花园的围墙上凿了许多孔，便于瞭望及射击。

围攻使馆的清兵和义和团，表现十分英勇，不断地趁着火势发动猛烈进攻，守卫在肃王府的日、意两国士兵，屡有伤亡。在开火的一星期后，日本军官发现北御河桥东边有大炮一

门，无人看守，日本军官想把它夺过来，便将围墙拆了一个豁口，带领着士兵和教徒们冲了出去。但在夺炮途中，受到了清兵的狙击，不但炮没有夺到手，反而遭到很大伤亡，连带队的军官也阵亡了。开火将及半个月以后，日、意两国士兵伤亡惨重，更兼肃王府面积广阔，在清兵及义和团的围攻下，阵地势难久守，于是公使团决定从肃王府后花园后撤，收缩阵地，重新部署。据我回忆当时布防的情形是：英国兵防守英使馆全境



王家俊绘

及翰林院迤北銮驾库迤东地区；俄国兵防守英使馆迤南达子馆及水关城上下；美国兵防守西线；法、德两国军队防守东线；原来防守在肃王府的日兵已伤亡殆尽，意、奥两国军队也受到重创，他们担任预备队，随时机动备用。剩下的还有由侨民组成的义务兵及由中国青壮年教徒组成的教民队，大约有六十余人，担任瞭望、警卫等工作。

在肃王府的中国教徒们，都迁移到肃王府西南方的一个院落里。这座院落位于英使馆的正东，与英使馆的东门仅隔一道五、六丈宽的御河，河水并不深。为了掩护御河东西两岸之间的通行，公使团决定从东岸到英使馆之间挖一条交通壕。这条壕很快就挖成了。

大约在开火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公使团被迫放弃了肃王府阵地，并命令御河以东地区的教徒一律撤退到西岸。于是我们便都通过交通壕转移到英使馆的南面，即达子馆和水关城根一带。当时麋集在使馆区的人是相当多的，但事隔多年，况且当时又未留心统计，故详细数字提不出来，估计总有数千人之多。据我的回忆，有英、美、德、法、俄、奥、意、日这八国的公使、随员及他们的家属，各国使馆的卫兵、军官及他们的家属，各国侨民及其家属，天主教、基督教的外籍传教士，还有他们所雇佣的中国工杂人员，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职员工，中外医务人员等，除以上人员而外，就是中国教徒及其家属了。其中能实际参加战斗的洋兵超不过千人。公使团把中国教徒中的青壮年也都组织起来，参加防御工作。从十六岁到四十岁的男教徒，都编队并发给臂章，每三十人为一队，由外国传教士率领。外国神甫和牧师平日虽然对中国教徒很和善，但这时却视如牛马一般，强迫中国教徒在阵地上搬砖、挖壕、抬沙

袋等，每日由上午六时一直干到下午八时，动不动就打骂，大家敢怒不敢言。外国传教士驱使中国教徒和洋兵一起参加战斗，凡不能参战的则分派担任瞭望或救护伤兵等工作，以及从事磨面、炊事等杂务。

使馆区虽然始终被清兵和义和团包围得水泄不通，但后来一段时间的攻势并不猛烈，等于是围而不攻，否则使馆区弹丸之地早就被攻下了。当时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在生活待遇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是有所区别的，外国人无论是官员、传教士还是士兵，生活供应较好，有酒有肉；至于中国人，凡是参加战斗的，每日供给三顿麦糠粥，一般人每日仅发给麦糠一杯，合老秤三两多。在围困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就是慈禧太后派人给公使团送来一大批蔬菜和水果，人们当时都猜不出其用意何在。后来有人说，清政府对使馆名为“围攻”，实为“围护”，看来这话是有些道理的。

公使团方面因为被困日久，对外联系断绝，处于内无粮秣，外无援兵的极端困难境地，于是便想用金钱募人去天津探听消息，搬兵求援。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董姓教徒，挺身而出，愿为公使团“效劳”。这个董某原是以拾破烂为生的。后来据他说：他将洋人交给他的信件用蜡纸包好，藏在他背着的竹筐底下，在一个黑夜里，从水关顺城而下，趁夜混出京城。沿途无阻，到了北仓附近，见有洋兵，他用左手摇着白手帕，将信件交给洋兵；旋即由洋兵把他带进营房，引见给外国军官，写了封回信，又交董带回。董返回北京后，仍在原出城的地方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与城内取得联系，然后洋兵用绳子将董系了进来。董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得了一笔赏金。

在使馆被围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在英国使馆的北面是清政府的翰林院，里面藏有上百万卷的书籍，据说都是珍贵版本。在使馆被围攻并逐渐缩小包围圈时，英国兵担心翰林院的存书如果中弹容易引起火灾，于是英国兵就把这些书籍都扔进院中的荷花池里，并用土掩盖上。这批极其珍贵的古版书籍就这样被毁掉了。

使馆被围困了将近两个月。到了农历七月中旬，清兵和义和团又突然发起猛攻，枪声密集，炮声隆隆，防线几乎被突破，洋兵伤亡者甚多，情势千钧一发。到了农历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那一天，天还没有亮，就听见从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大炮声，把人们从梦中惊醒了。接着就听说是天津方面的援兵到了，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就在当天的下午三点钟左右，在南御河桥旁，修了一条临时马路，拉过来两门六英寸口径的大炮，后面跟着很多英国兵和印度兵，有几个英国军官躺在搭着布棚子的竹床上，由四名印度兵抬着，进入了英国使馆。原来这些英国兵都是从水关下面钻进来的。接着洋兵就向清兵发起反攻，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清兵败退，使馆从而解围。

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带了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

（一九六三年旧稿，卞汲夫整理）

庚子沦陷后的天津

李 然 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仇教灭洋，以致各国有所借口，以保护侨民为名，调军队来华，组成八国联军（英、法、俄、德、日、意、美、奥），攻打天津。旧历六月十八日破晓，津城陷于敌手。城破后，侵略军杀烧抢掠，惨绝人寰，造成空前的浩劫。

在敌人围攻时，城内各行政长官，如兵备道王仁保、天津府知府林际康等先后弃任逃走，驻守无人，空城孤立。到了六月十六日以后，传来前方失利消息，居民纷纷向城外逃避，城内商店亦大多停市。及至十八日拂晓城破后，居民争向北门逃走，途中拥挤不堪。外逃之居民多被洋兵打死在街头，各通行大道，无不尸体狼藉，血流满街。洋兵驱散行人之后，即开始抢掠，到处砸门搜敛，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再抢其他商店和大户人家。长芦盐运使署（当时在鼓楼南）、道衙门（在东门里）的银库存银，都被抢掠一空。其余各衙署，如府衙（在北门里）、县衙（在鼓楼北）也都被捣毁。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带，如城北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肉市口都遭到洗劫，只有针市街、缸店街等处，因为多是内局和客

栈，没有门面，有的未遭洗劫。城东的宫南、宫北、小洋货街一带，尽被抢光。城内住户，凡中等以上者无不波及。洋兵在抢劫中还犯下奸淫妇女的兽行。有些不安分的人也乘机出动，趁火打劫，被洋兵枪杀者不少。洋兵在杀戮抢劫及奸淫妇女之后，便开始放火，当时虽有若干家水会，但谁也不敢舍命出来救火，只好任其燃烧。

如是烧杀淫劫，整整混乱了三天以后，天津城内外遍地尸体横陈，火光不熄，真是凄惨万状。三天以后，各国军队才联合出示安民，伪善地禁止洋兵抢夺，洋兵也都各自集合起来，安排宿营处所。这时除去贫苦人家以外，全城已经是十室九空了。

接着就是抓夫清街。洋兵到处抓人，强派劳役，运死尸，清秽土，掏厕所，以及为洋兵搬运物品。对于体弱力薄抬不动重物的，动辄鞭笞，抓到衣着整洁的人，偏令其作脏活。因而居民们白天不敢在大街上露面，只好在小巷绕道而行，以免被抓劳役。

联军安民以后，接着便在总督衙门设立“都统衙门”，作为侵略军临时统治的政权机构，由各国军官共同管理地方行政，遇有诉讼案件统由都统衙门审理。各国军队把天津城内城外划分为八个管理区，由各国分别管辖，地方行政大权全部落入侵略军手中。

侵略军通华语者不多，少得要招募翻译人员。当时懂得外文的多系水师学堂出身的海军人员，但应募者为数寥寥。为侵略军当翻译的多系租界里洋行、酒馆、妓院中当“百役”的。他们只能讲几句普通的洋话，遇有诉讼案件，翻得驴唇不对马

嘴，笑话百出。但这些翻译，因为替洋人办事，对外却能作威作福，借端讹索，一般人都不敢得罪他们。

各国军队分治各区，各订有不同的规章。如街道卫生，由各住户负责打扫，洋兵每天沿街巡逻，挨户踹大门，喝令出来扫街，出来晚了就拳打脚踢，有时还要罚款。有的男人不在家，少妇怕受辱不敢露面，多由老妇出来应承。街上不得任意便溺，违者罚洋一元。在夜间各户门外都要装设一盏门灯，每晚必须点燃，如果夜晚不着，就要罚洋一元。那时门灯点的大多是蜡烛，风吹雨淋，免不了熄灭，住户怕罚，夜晚总要出来察看几次。后来多改用煤油灯，比较好些。但是偏偏有些民族败类，勾结洋兵，迫害同胞，这些坏人把住户的门灯偷走或者吹灭，然后领来洋兵，敲门诈索罚款，彼此俵分。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因此遭到打骂及罚款。后来，有些人家把墙挖一个洞，前面装上玻璃，从后面放灯，才不致被坏人吹灭。那时路上行人在夜间必须提着灯笼，否则也要处罚，就是月明如昼，外出时也得提灯。转年“辛丑条约”缔结后，联军还政，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门灯制度仍继续保持。后来改设路灯，由住户分摊费用，才免除了各家设门灯的麻烦。

侵略军为了管理卫生，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充当卫生巡捕，因为他们穿的制服袖口上有一段黄布，大家便称他们为“黄袖头儿”。“黄袖头儿”倚仗洋人势力，任意挑剔诈索，作恶不在洋人以下。

法国兵管理城西一带，他们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夜间禁止晚睡，各商店、住户十时以前必须熄灯，否则罚款。凡逾时未熄灯者，洋兵立即敲门质问，就是遇有婚丧大事也不能破例。在侵略者统治下，人民起居自由尽被剥夺。

在联军管辖下，地方的一切收入都归他们所有，地方所需之开销理应也从中支取，但是不然，各国军队勒令民间供应鸡、鸭、鱼、肉、鸡蛋等物，每天规定一定的数额，由商民筹措提供。洋人并不直接索取，派出中国巡捕代为办理，巡捕们在正额之外，还要另外勒索，商民皆苦不堪言。后来有些绅商向都统衙门请求，由绅商出资设立“支应局”，统一向联军提供所需物品，才免去巡捕们的任意骚扰。支应局的承办者当然也免不了额外苛求，但总不象巡捕那样难于应付了。

洋兵多有饮酒之癖，吃醉以后就在街头胡闹，晚间尤甚。行人躲避不及，即遭踢打，有时甚至拔出刺刀乱刺，街上顿时大乱，洋兵鼓掌大笑，以资取乐。有时洋兵乘醉闯入商店，任意索要东西，商人们也无可奈何。

过去在旧历春节时，熟人相遇彼此作揖拜年，这是多年沿袭下来的风俗，却不料遭到洋兵之忌。洋兵误认为作揖是义和团作法的仪式，见到街上有作揖的人，立刻捉了起来，虽然百般哀求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有通外语的人，说明这是民间风俗，才消除误会，但是还要罚一笔款才能释放。当时有人编了几句流口辙：“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儿低不点儿低。”（点儿低指赌博时的骰子点儿）

辛丑年（1901）天津流行春瘟，到了夏天又发现霍乱，洋人感到非常紧张，都统衙门立即进行防疫工作，给天津居民又带来新的灾难。防疫工作由日本人负责，他们得到疫情报告后，带着“黄袖头儿”迅速奔向病患者，既不问病状，也不予治疗，却把大量的石灰洒在病人身上及周围，不少垂危的病人因而呛死，然后便抬走焚化。这样一来，直弄得人心惶惶，得了病也

不敢声张，唯恐被胡里糊涂地当作霍乱患者而屈死。

庚子之乱，有人由富变穷，有人由穷变富。凡是遭到洗劫的人家，家破人亡，由富变穷，而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则由穷变富了。趁火打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洋行混事由的大小买办们，在外国洋行勒索赔款时，他们也开具失单附在其中，凭空索取一大笔赔款；另一种是乱中行抢的，人称之为“抢哥儿”，铤而走险，大发横财。这些因抢掠而暴富的人，有的开了买卖，如我的亲戚杨竹坡，就在河北开了个利华军衣庄；但“抢哥儿”中的大多数，外财到手，尽情挥霍，不出一、二年又变成穷光蛋。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商人也发了财。在侵略军撤离中国时，洋兵们纷纷处理他们抢劫来的脏物，因而临时出现了许多收购旧物的铺子，多在估衣街一带。洋兵不熟悉行情，也不懂中国话，他们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放，就用手势和中国商人讨价还价，好在东西是抢来的，卖多卖少也不计较，因此商人们大发其财。

上述这些暴发户，人们通称之为“六月十八的财主”。这个名词一直到二、三十年后尚被人经常提起，盖含有讥讽之意也。

（一九六五年旧稿，卞汲夫整理）

庚子回忆片断

庚子见闻

张修华

我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父亲是天后宫道士，闹义和团那年我八岁，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能回忆上来一些。

那时我家住在河北望海楼后蓝家胡同。望海楼建有一座天主教堂，那一带的天主教势力很大，外国传教士作威作福，更有一般走狗为虎作伥，仗势欺人。同治九年（1870）曾经发生过“天津教案”，火烧了望海楼教堂，结果有十六名中国人惨遭刑戮，在人民群众的心里留下了仇恨。天主教堂为了扩张势力，勾引人入洋教，愿来者一律给三块银洋，因而多有不法之徒投身教堂。当地居民都不敢得罪教徒，谁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但凭神父一张字条就把你告到当官；这一来，就成了一面官司，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一律以“欺辱教民”论罪，轻则掌嘴打板子，重的还要枷号游街示众。百姓畏洋教如虎，彼此告诫，千万别惹教徒。

义和团发源于山东，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镇压的手段，所以又辗转发展到直隶（今河北省），特别盛行于天津一带。当义和团进入天津城时，团众声势浩大，纪律严明，百姓敬如神明，跪接跪迎。义和团的活动带有民间旧传的

迷信色彩，讲求设坛焚香降神，在天津遍设坛口。首领曹福田的总坛设在西头永丰屯吕祖堂，是个道教庙；离我家最近的坛口设在河北大胡同净业庵，也是个道教庙。我被好奇心所趋使，曾去观看义和团练拳和焚香求神的情形。他们练武的主要兵器是大刀片和红缨枪，耍起大刀片寒光闪闪，抖动长枪冷风飕飕。他们求神时，向东南方下拜，焚香，烧黄表，然后就说某神下界了，脸色也变了，呼哧呼哧地喘大气，说是能刀枪不入。义和团见了洋人就杀，把仗着洋人势力欺压群众的狗腿子都当作奸细，对其中民愤大的处死投尸河中，为民除害，一时群众称快。

人民群众对望海楼教堂的洋人和教徒是怀恨在心的，这时有了义和团为之撑腰，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旧历五月十九日（公历六月十五日），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把教堂烧毁以后，群众还不解气，于是，拿镐的拿镐，持锹的持锹，要把这座帝国主义的侵略大本营连根刨掉。当时民气很盛，男妇老幼一齐动手，我也拿把小铲子学大人的样子跟着一块挖。正在大家忙着挖教堂的时候，忽然传说外国军队开来天津，只得把扒教堂的举动停下来，转向支援义和团打鬼子。家家烙红糖大饼，熬绿豆汤，送上前线犒劳义和团；在大饼上还用毛笔写上“得胜大饼”四个字。我在私塾练过毛笔字，也跟着在大饼上七扭八歪地写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前线在河东新官汛，与驻在老龙头火车站（今东站）的洋兵对峙，战事相当激烈。

各国侵略军不断增援，猛烈进攻，终于在旧历六月十八日（公历七月十四日）从南门攻破天津城。侵略军进城后，杀烧抢掠，奸淫妇女，极其残暴，尤以俄国兵的纪律最坏。侵略军